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 中国现当代 文学史

(下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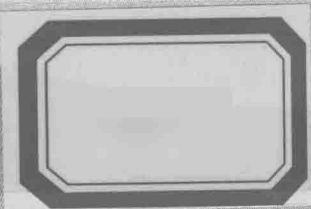


高 玉◎主编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 中国现当代 文学史

(下册)



高 玉◎主编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 高玉主编.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7-308-12009-8

I. ①中… II. ①高…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史—高等学校—教材②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史—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84393 号

##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高 玉 主编

---

责任编辑 宋旭华

封面设计 续设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40.25

字 数 750 千

版 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2009-8

定 价 68.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bs.tmall.com>

# 目 录

## CONTENTS

第五章 “十七年”文学 .....	001
第一节 新中国文学的生态和体制 .....	001
一 文学转折和第一次文代会 .....	001
二 新中国文学的体制 .....	003
三 文艺批判运动和政策调整 .....	005
第二节 “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 .....	009
一 概述 .....	009
二 赵树理的小说及其评价史 .....	010
三 柳青的《创业史》及其争论 .....	014
四 周立波《山乡巨变》的民俗乡情 .....	016
五 “十七年”农村题材短篇小说 .....	017
第三节 “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 .....	022
一 “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发展概述 .....	022
二 “史诗性”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 .....	024
三 “传奇性”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 .....	027
四 孙犁的“抒情性”革命历史小说 .....	030
五 反映知识分子成长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 .....	032
六 《红岩》的写作方式及其教科书功能 .....	034
七 革命历史题材短篇小说 .....	035
第四节 诗歌 .....	039
一 当代新诗发展的传统和特点 .....	039

二 叙事诗和政治抒情诗 .....	041
三 郭小川现象 .....	043
第五节 散文 .....	045
一 概况 .....	045
二 主要散文作家 .....	047
三 杂文创作 .....	050
第六节 戏剧 .....	053
一 概况 .....	053
二 老舍《茶馆》 .....	054
三 历史剧的创作 .....	056
四 “革命教育”话剧 .....	058
<b>第六章 “文革”文学 .....</b>	<b>062</b>
第一节 “文革”文学理论 .....	062
一 《纪要》的主要内容 .....	062
二 与《纪要》相关的文学理论 .....	066
第二节 “文革”小说 .....	068
一 样板小说 .....	068
二 时代小说 .....	073
三 “文革”地下小说 .....	089
第三节 “文革”戏剧 .....	091
一 样板戏的来源与命名 .....	091
二 “文革”样板戏 .....	093
三 话剧 .....	099
四 其他戏剧 .....	105
第四节 “文革”诗歌 .....	109
一 时代诗歌 .....	110
二 非典型诗歌 .....	113
三 地下诗歌 .....	116
第五节 “文革”散文 .....	125

第七章 新时期文学 .....	130
第一节 新时期文学的政治维度 .....	130
一 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与改革文学 .....	130
二 政治题材叙事与人文生态乱象 .....	134
第二节 新时期文学的文化想象 .....	138
一 传统与现代对话的多重姿态 .....	138
二 多元文化形象的结构内质 .....	142
第三节 新时期文学的生命向度 .....	146
一 “海碰子”、“画屋师”与“拉边套”男女 .....	146
二 爱的权力、自我意识与女性文学 .....	149
三 青春理想、激情苦难与知青文学 .....	153
第四节 新时期文学的形式美学 .....	156
一 陌生化、意识流与形式先锋探索 .....	156
二 含味非常岁月的素朴美 .....	160
三 在苦难中流淌的乡土美 .....	164
四 还原自然生命的本真美 .....	167
第八章 80年代文学 .....	171
第一节 “朦胧诗”与80年代诗歌格局 .....	171
一 从《今天》走进论争的声浪 .....	171
二 集体经验的“自我”展现 .....	173
三 “朦胧诗”与80年代诗歌格局 .....	174
第二节 “寻根文学” .....	176
一 从“杭州”会议到“寻根”宣言 .....	176
二 文化之“根”与小说艺术形态 .....	177
第三节 “先锋小说” .....	180
一 “先锋小说”的出场与文学形式实验 .....	180
二 形式变革的深意:艺术真实观之变 .....	181
三 未尽的“先锋” .....	182

第四节 “新写实小说”:面向日常生活的写实 .....	184
一 命名中的“现实”期待 .....	184
二 日常生活的客观化叙事 .....	185
第五节 女性散文 .....	187
一 女性散文作家群的显现 .....	187
二 “人性”话语建构中的精神取向 .....	187
三 “自我”的艰难追寻 .....	189
第六节 “实验戏剧” .....	190
一 从配合时势之作到戏剧观大讨论 .....	190
二 “实验戏剧”的艺术探索 .....	192
<b>第九章 90年代文学</b> .....	<b>195</b>
第一节 重识“90年代文学” .....	195
一 背景与概况:从“文化热”到“经济热” .....	196
二 平静与焦灼:“90年代文学”的开始 .....	198
三 市场与转型:90年代的拐点 .....	202
四 文学史观与分期:90年代的文学史意义 .....	205
第二节 90年代文学事件与现象 .....	210
一 文学的底层:从“新写实”到“冲击波”、“底层文学” .....	210
二 在两岸文学与女性文学格局中的“三毛热” .....	213
三 “下海”与文学的商业化 .....	214
四 “废都”与“废墟”:关于陕军东征与人文精神讨论 .....	216
五 网络文学兴起的时代 .....	217
第三节 90年代文学创作 .....	220
一 长篇小说热 .....	220
二 诗歌 .....	227
三 散文 .....	235
<b>第十章 新世纪文学</b> .....	<b>243</b>
第一节 新世纪文学的发生和文学场的划分 .....	243

一	新世纪文学的起点:聚焦 1997 .....	243
二	文学制度与新世纪文学的发生 .....	245
三	媒介传播与新世纪文学的发生 .....	248
四	消费文化与新世纪文学的发生 .....	249
五	新世纪的三个文学场域及其写作规则 .....	250
第二节	主流文学的创作转向 .....	253
一	刘震云:从小说到影视 .....	253
二	余华:从个体到群体 .....	258
三	韩东:从诗歌到小说 .....	263
四	残雪:从艺术到真理 .....	268
第三节	消费文学的文学景观 .....	270
一	韩寒现象:“什么坛也都是祭坛” .....	270
二	郭敬明现象:“45 度仰望天空” .....	274
三	“80 后写作”与网络类型文学 .....	278
第四节	独立文学的艺术潜流 .....	281
一	王小波:“对文学可能性的自由探求” .....	281
二	“文学自由坛”文学 .....	284
三	陈卫:“对不可言说之物的独立言说” .....	293
四	“黑蓝”文学 .....	296
后记	.....	308





## 第五章 “十七年”文学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宣布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十七年”文学由此拉开了序幕。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这一时间段的文学，即是“十七年”文学，它是“当代文学”的重要发生阶段。在这一时期，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按照意识形态的需要必须以“一元化”的方式存在，不同思想和艺术倾向的作家和作家群的共同存在已成为过去，左翼文学从30年代产生到解放区文学不断发展壮大，在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政权的确立也进一步成为文艺界唯一的主导力量。

### 第一节 新中国文学的生态和体制

新中国建立后，新的文学体制逐步建立起来，包括文艺方针和政策的制定，作家的组织管理，文学作品的出版发行，文学批评的原则和规范的确立和实施等，它们共同构筑了新中国文学的时代规范。

#### 一 文学转折和第一次文代会

新中国文学作为当代文学的发生期，它与现代文学的关系并非泾渭分明。按照以1949年为分界点，把20世纪文学划分为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两大块的分期法，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之间似乎有着天壤之别，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首先，一大批现代时期的重要作家如老舍、丁玲、郭沫若、冰心、曹禺、穆旦、艾青等都跨越了现代和当代两个文学时期。其次，新中国文学与作为现代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有着直接的师承关系。再者，“五四”文学精神在新中国文学的发展中虽然已不被主流文学所提倡，但却也并未消失，而是形成了一种非主流和隐

性的发展线索,对此,陈思和提出了“潜在书写”<sup>①</sup>的概念,它体现了当代文学对“五四”文学传统的继承关系。

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是文学转折的标志性事件。1949年7月2日到19日,来自解放区、国统区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在北平举行了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简称“第一次文代会”),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和被邀请的非正式代表共计824人,这次会议被看做是40年代不同政权下的文艺工作者的会师性大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陆定一等国家领导人参加了会议并发表讲话,这反映了国家政权对文学艺术之于国家建设的重要作用的高度重视。茅盾、周扬等文艺界领导人也作了更具针对性的报告。周扬对解放区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延安讲话”)精神的文学成果进行了总结和肯定。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自其诞生起就被看做是左翼文化前进的指南针,而第一次文代会进一步明确地提出建国后新的文艺方向仍然是进一步贯彻“延安讲话”精神。

第一次文代会具有明确的政治倾向性,国家领导人和文艺界领导的发言都对40年代不同区域的文艺创作的成就进行了等级性的划分和认定,在毛泽东“延安讲话”精神指导下的解放区文学具有明显高于国统区文学的政治优势。由此,第一次文代会确立了新中国的文艺发展方向,也就是以毛泽东“延安讲话”为根本的指导思想,不同政治信仰、文学立场的作家都被统一到相同的政治规范下进行文学实践活动。从理论上讲,过去一些具有争议性的问题如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等似乎都不复存在了,都得到了解决。但实际上,尽管新的文学体制的建立是以获得文化领导权的高度集中和统一为目标,但并不意味着在这一新的文化阵营内部,不同的文学观念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就消失了。可以看到,在“十七年”文学中,不同的文学观念、创作追求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仍然存在,甚至在某些时候冲突还会非常激烈,这也就造成了建国后文坛不断“起伏”的状况,虽然“起伏”的结果最终也是回到“文学政治化”的轨道上来,但这一变动过程已充分说明即使在政治化的环境中文学也存在着一定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可能。

文学转折并不意味着新中国文学是一个零的开始,新中国文学本是在多种文学传统的背景下起步的,而从各种文学传统中汲取养分也是它发展的必然前提。从纵向来看,“五四”文学传统作为现代思想和文化的母体,对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这种影响同样也延续到革命战争文化中,毛泽东以及文艺界的领导人从延安时期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下称建国)后都强调“五四”文化和文学对无产阶级文学的重要意义,因此,“五四”文学传统对于新中国文学来说是不

<sup>①</sup>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前言》第12页。

能回避的精神资源；此外，新中国文学作为解放区文学的合理延伸，毛泽东“延安讲话”是指导新中国文学前进的纲领性文件，引领着新中国文学的发展并塑造了新中国文学的基本品格。从横向来看，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老大哥”，它的文学经验对新中国文学的借鉴意义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当时很多文艺方针和政策的制定、文艺理论的建设等都直接师从于苏联经验。

但是，以上三种文学资源对新中国文学的发生和发展的影响却并非在同一个平台上，由于政治话语在不同时期对这些文学资源所赋予的价值等级是不同的，这些文学传统和资源对新中国文学的影响也存在着显和隐，主和次，强和弱等不同层次的区别。同时，新中国文学对每一种文学资源的评价和接受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带有浓厚的主观性和当下性，因此对这些传统和资源的继承和吸收也是有选择、有轻重的。在对待“五四”文学传统的立场上，在处理“五四”文学传统和解放区文学传统的关系上，在借鉴苏联文学经验的态度上，都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理解，即使主流文学对这些问题的态度也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

## 二 新中国文学的体制

意识形态的规范和管理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艺术作为构成意识形态的重要力量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当代文学体制的建立和实施就是政府对于文学艺术领导、监督和控制的具体化，包括文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文学运作方式的形成以及管理、监督机制的建立等方面的内容。

从第一次文代会到以后的各次“文代会”，“文学艺术的组织领导”的重要性问题一直都被强调，其中，中国文联和作协的管理、监督、组织功能更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胜负成败。第一次文代会成立了全国性的文艺界组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即“全国文联”（后改名为“中国文联”），通过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章程》，选举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以及属于“文联”管理的各种协会的负责人。“文代会”后，又陆续成立了下属于“文联”的各种协会，属于文学创作领域的就是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名为中国作协）。五六十年代的文艺批判运动以及对重大的理论问题的讨论，都是由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领导的，在对作家的监督、管理中，它们常以“决议”的方式对作家和事件作出政治裁决。同时，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内都设有“党组”，并下属于中宣部；也就是说，作家的创作受到党的直接领导。通过统一性的组织和管理机构以及规范化的章程和制度，新中国的文学体制逐步建立起来，它为国家和政党对作家及其创作的管理提供了保证。

在文学体制的建立中，报纸、杂志也是重要的文学组织形式，它们是党在文艺界行使其机能的重要媒介。期刊、报纸一方面对文学创作、交流活动有积极的协调

作用,另一方面它们作为党的机关刊物,通过开展文学批评对政策导向和舆论宣传起着重要作用。全国文联和中国作协的机关刊物最重要的是《文艺报》和《人民文学》,它们的主编和编委通常是文艺界的高层领导人,不过,由于政治运动的频繁更迭,这些机关刊物的领导人也经常变更。

在文学体制的建立中,除了报纸、杂志外,“会议”也是重要的文学组织形式,它对当代文学的进程有着深刻的影响,“有关文学的重要会议,是传达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统一思想步调、布置当前任务、制定长远规划、矫枉纠偏等的主要形式”<sup>①</sup>。当代文学会议具有浓厚的政治性,它是建构适应政权需要的文学秩序不可缺少的组织形式,对于文学格局的调整和转换具有重要作用。综上所述,领导管理机构、机关刊物、报纸以及文学会议等因素共同建构了当代文学的生态环境。

文学批评和文艺政策也是构成新中国文学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批评不具有从文学的角度对作品进行批评、评价的功能,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更多发挥的是政治性的功能。文学批评没有独立的标准,政治话语规范即是文学的标准,不仅如此,文学批评常常是政治运动的风向标和晴雨表。

政治对文学批评的过分干预导致了文学批评的政治化和主观化,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一个阶级一个典型”、“一种生活一个题材”、“一个题材一个主题”<sup>②</sup>。庸俗社会学的批评方法把作品中的艺术问题直接等同于作家的政治倾向和立场,在批评方式上随意“带帽子”、“打棍子”,用词武断、粗暴,常常是“断章取义、寻章摘句、咬文嚼字,或者莫须有地,就给作者按上了罪名”。<sup>③</sup>

不过,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批评活动并不是完全单一化的。这是因为主流文学批评一方面要保证文学在政治上的正确性和稳定性,对小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清理和批判;另一方面也要保证文学对于政治宣传的有效性,对文学创作的公式化和概念化倾向进行纠正,因而经常会在这之间进行调整。表现在不同的时期,主流文学批评对这两方面各有侧重,同时,两方面的交锋也间隔一段时间就出现。建国后的文学界就出现过三次大的文艺争鸣,第一次是50年代初期围绕胡风、阿垅、路翎等的文艺思想展开的文艺论争;第二次是50年代中期“双百”时期围绕秦兆阳、陈涌、巴人、钱谷融、刘绍棠等的文艺观点展开的论争;第三次是60年代初期围绕邵荃麟、李何林等人的文艺观点展开的论争。这说明,文学批评的开展并非都能在意识形态的规范和掌控之中,实践和理论之间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偏差。

五六十年代从事文学批评的理论家除了以周扬、邵荃麟、林默涵、张光年、冯雪

① 孟繁华:《中国当代文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页。

② 于晴:《批评的歧路》,《文艺报》,1957年第4期。

③ 于晴:《批评的歧路》,《文艺报》,1957年第4期。

峰等为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化的文学批评之外,还有一些“非主流”的文学批评,这主要是以胡风、路翎、秦兆阳、黄秋耘等为代表的,他们的文学批评理论思想表现出不同于主导的文学观念的勇气和坚持。此外,还有以作家为主体的经验式文学批评,如茅盾、赵树理、孙犁、周立波等作家的文学批评,他们的文学批评表现出对创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的探讨。文学批评家的这种分层也使得五六十年代的文学批评活动表现出并非单一化的面貌。

### 三 文艺批判运动和政策调整

文学批评在五六十年的极端形式就是文艺批判运动,建国后有四次大规模的文艺批判运动,它们的发展演变过程充分说明了五六十年代文学批评活动的特点,由此也可以看到当时文学创作的生态环境。

#### 1.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次大的文艺批判运动。孙瑜于1948年就开始拍摄电影《武训传》,描写的是清末山东堂邑县贫农武训行乞办学的事,不过拍了一半就中断了。1949年1月,私营上海昆仑公司收买了该片的摄制权和已拍的胶片,1950年,该公司对剧本进行修改后重新拍摄。电影由赵丹主演,孙瑜导演,到年底拍摄完成。电影公映后,好评如潮。但是,毛泽东看了这部电影后,却并不认同这部电影和当时大家的评价。1951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社论《应该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是经毛泽东本人大量修改后最后定稿的,基本上可看作毛泽东个人的文章。社论认为《武训传》宣传了封建文化,污蔑农民革命斗争,并对目前文艺批评界的“混乱”态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sup>①</sup>这篇社论发表后,文艺界对《武训传》的态度急转直下,为了响应《人民日报》的号召,当时郭沫若、周扬、何其芳、邓友梅、夏衍、袁水拍等都发表文章作出回应,对《武训传》进行批判。然而,无论电影《武训传》有怎样的失误,都应该是文艺界内部的问题,而不应该形成如此大规模的政治批判。这次批判运动持续半年之久,首开用政治运动解决文艺问题的先河。

#### 2. 对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

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之后,文学界对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接踵而来。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发表在1950年第3期的《人民文学》上,小说讲述的是解放后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干部李克和农民出身的革命妻子在进城之后两人之间所发生的矛盾。小说对妻子的生活、语言习惯和对李克的审美趣味的描写被指责有丑化“工农兵”、迎合小市民趣味的嫌疑,当时陈涌、李定中(冯雪峰)、丁玲、

<sup>①</sup> 《应该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人民日报》1951年5月20日。

康濯都写了批判文章。

### 3. 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俞平伯是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其《红楼梦》研究受胡适研究方法的影响,注重考证,是“新红学”的代表人物,他于1923年曾出版过《红楼梦辨》。1952年,俞平伯在《红楼梦辨》的基础上,通过对它的删改、增订,出版了《红楼梦研究》一书。

俞平伯通过多年的研究,形成了对《红楼梦》的独特看法。他认为《红楼梦》是作者个人的自叙传,其表达的主要观念是“色”、“空”,风格是“怨而不怒”,在文学继承上是接受和发展了唐传奇、宋话本的传统,并受到了《西厢记》、《水浒传》、《金瓶梅》等小说的影响。这些观点显然是与当时政治化的环境格格不入的。当时有两位青年研究者李希凡、蓝翎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观念对俞平伯的研究表示质疑,认为俞平伯否定了《红楼梦》的反封建倾向。他们写成《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并投到《文艺报》,却没有被接纳,后来另投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发表(1954年9月号)。文章指出:“俞平伯先生离开了现实主义的批评原则,离开了明确的阶级观点,从抽象的艺术观点出发,本末倒置地把水浒贬为一部过火的‘怒书’,且对他所谓的红楼梦的‘怨而不怒’的风格大肆赞扬,实质上是企图减低红楼梦反封建的现实意义。”另有一文《评〈红楼梦研究〉》在《光明日报》上发表(1954年10月10日)。

毛泽东后来看了驳俞平伯的这两篇文章,并了解了整个事情的经过,在1954年10月16日给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信,信中表示这是一场反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随即,《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判的矛头不仅指向胡适、俞平伯,也指向《文艺报》编委。接着,文艺界全面展开了批判运动,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连续召开了四次扩大联席会议。这场批判运动由开始的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逐渐转向对胡适文学观念的批判,并且由文学领域逐渐转向整个文化学术领域,这也正是毛泽东发起这场文艺运动的真正动机,即彻底消除胡适等资产阶级思想在社会主义的影响和存留。

### 4. 对胡风“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

胡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卓有成就的理论家和诗人,作为“七月派”的理论建设者,胡风的现实主义理论对“七月派”的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然而,由于文艺观念的差异,胡风与周扬之间一直存在着分歧,他们的矛盾造成了左翼内部两大阵营的分立。

1954年胡风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写成了近三十万字的《关于解放以后的文艺实践情况报告》(简称“意见书”)上呈给中央,他严厉地指出了建国以来文艺界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具体的改革的措施方案。接着,在对《红楼梦》研究和《文艺报》的批判中,胡风的发言进一步把矛头引向自身。1955年1月

26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宣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意味着对胡风的批判成为全国性的运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在《人民日报》等刊物上公开发表。这些材料都经毛泽东审阅,在发表时都由毛泽东亲自加了按语和注释,至此,胡风事件的性质升级了。胡风于5月18日被拘捕,5月25日,以胡风为首的“七月派”被定性为“反党、反人民、反革命集团”。“胡风案件”是中国当代文学体制化的一种极致体现,它所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包含着严峻的历史教训。

### 5. 文艺政策的两次调整

当政治和文学的关系达到一种异常紧张的状态之后,会出现一个间歇和松弛期。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文学自身的弹性并调动作家创作的积极性,政治会给予文学稍宽松的生存空间,1956—1957年“双百”方针的提出,1961—1962年文艺政策的调整,都是如此。在这些短暂的时间段中,文学创作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稍稍得到了一些恢复,对各种文学理论问题的探讨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繁荣。

#### “双百”方针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八个字成为一句口号,有一个历史过程。从1951年到1956年,毛泽东在不同的场合都提到“百花齐放”一词,而正式公开向全国阐释毛泽东的这一思想的是陆定一。1956年5月26日,陆定一在怀仁堂向科学界和文艺界的代表人物做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系统全面地阐释了这一方针的内涵,他说:“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sup>①</sup>自由宽松的文学创作和批评、研究空间是文学事业发展的基本前提,也是经历了建国后一次又一次的批判运动后历史经验的总结。

随着党对“双百”方针政策提倡的不断升温,文艺界的很多知识分子逐渐放下了心中的疑虑,过去不敢涉猎的题材开始有作家来关注,过去不敢谈论的理论问题开始有批评家来讨论、反思,文艺界出现了一派枯木逢春的景象。

首先是理论界对文学创作问题的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问题,典型性、形象思维的问题,作品的真实性、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关系问题,歌颂与暴露、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问题,文艺的特征和规律问题,如何理解和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问题等都在这一时期被重新提出来讨论。这次讨论中影响较大的文章有:何直(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周勃的《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陈涌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巴人(王任叔)的《论人情》、王淑明的《论人情与人性》、刘绍棠的《我对

<sup>①</sup> 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民日报》,1956年6月13日。

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浅见》、钟惦棐的《电影的锣鼓》等,这些文章从各个角度展开了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的各种问题的反思和思考,体现出思想解放,大胆反思和质疑的特点。

其次,在文学创作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敢于暴露和批判被称作“干预生活”的作品,如刘宾雁的特写《在桥梁工地上》和《本报内部消息》,耿简的《爬在旗杆上的人》,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李国文的《改选》,刘绍棠的《田野落霞》等。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反映“家务事,儿女情”题材的作品,如宗璞的《红豆》,邓友梅的《在悬崖上》,陆文夫的《小巷深处》等。这些作品由于涉足了一些过去的题材禁区,突破了过去陈旧的创作模式,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都有较大的提升,因而给文坛带来了一股新鲜的气息。

不过,随即的1957年“反右”运动的迅速启动使知识分子措手不及,一大批在“双百”时期发表了“鸣放”言论的理论家以及一些发表“干预生活”作品的作家都被打成了“右派”。“反右”运动中,当时在文艺界被打成“反党集团”的除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外,还有“江丰反党集团”、“吴祖光右派集团”等。“反右”运动中,周扬在一次会议上宣读的报告《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sup>①</sup>是对这一场运动的总结。

#### 60年代初文艺政策的调整

1958年,中国进行了大跃进运动,不仅粮食、钢铁放出一颗颗“卫星”,在文学领域,诗歌创作也展开了“新民歌”运动,无数的诗人和诗歌一时间被生产出来,整个国家呈现出一种浮夸的状态,而从1959年至1961年,自然灾害、“反右倾”、“反修正主义”这些天灾人祸使得当时国家的状况雪上加霜。针对这种状况,党中央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国民经济等各个方面从1962年开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同时,从1961年至1962年,文艺界也进行了方针政策的调整,对文学的典型、题材问题,文学共鸣问题,山水诗问题,戏剧冲突和历史剧问题,形象思维问题等,展开了讨论,这次的文艺政策调整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在这次调整期,共召开了三次重要的会议,它们是1961年6月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简称“新侨会议”),1962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简称“广州会议”),以及1962年8月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简称“大连会议”)。这三次会议对当时文学状况的调整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作为这几次会议精神集中体现的是最后下发的“文艺八条”。它最初的雏形是在新侨会议讨论的文件《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文艺十条”),

<sup>①</sup> 该文原载1958年2月《人民日报》和1958年第4期《文艺报》。



经过反复讨论、修改,报送中央批准后,出台了八条全局性的指导原则即所谓的“文艺八条”,主要内容包括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努力提高创作质量,批判地继承民族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正确地开展文艺批评,改进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等。

## 第二节 “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

### 一 概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文学也进入了新时期。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学需要为刚刚与“旧世界”彻底决裂的人民群众提供生动的艺术形象,使人们可以进入历史情境,并理解历史发展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因而,文学创作一方面为历史的发展提供了文学性的解读,另一方面也为现实的存在提供了政治性的引导。

在“十七年”的小说创作中,题材的选取是优先考量的问题之一,这不仅因为当时的文学界把题材的优劣作为判断作品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更因为题材问题在多次文艺论争和批判运动中都是关注的焦点。以“社会群体的政治生活”<sup>①</sup>为依据,文学界逐渐形成了诸如工业题材、农村题材、革命历史题材等特定的题材分类概念。严格的题材分类,为排列题材的主次提供了必要条件,处于不同位次的题材类别在“十七年”被赋予了不同的价值。比如,“工农兵”题材的作品就比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地位高,反映重大斗争的作品就比反映个人生活的作品价值大,以现实政治任务为题材的作品就优于以中国古代历史为题材的作品。

在这些不同的题材类别中,农村题材小说无论是在作品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高居榜首。农村题材小说之所以能在建国后迅速崛起,一方面是得益于对“五四”新文学中的“乡土文学”传统的延续;另一方面则是得益于作家们长期生活、工作在农村所积累的丰富情感经验和实践经验;更重要的还是得益于当时的文学界对农村题材小说的重视。

1950年冬天,一场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对社会主义中国理想蓝图的描绘首先从农村开始,政治的主导与作家的自觉在这里得到有效的结合,从“土改”到农村合作化运动,再到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村开展的一系列重要的政治运动和事件都在小说中得到了反映,作

<sup>①</sup>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5页。